

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逻辑转向与价值重构

范旖旎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8日

摘要

教师权威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获得的让学生信服的力量或影响力。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数智时代, 这种权威正面临深刻转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 教师作为知识唯一来源和道德引导者的传统角色受到挑战, 教师权威的传统基础因此发生动摇。本文从教师权威的多维度界定与演变出发, 分析其消解所带来的优势、弊端与外在挑战, 并立足数智时代的教育特点, 提出传统权威、法定权威、知识权威与感召权威四个维度的转型与重塑路径。数智时代的教师权威建构需要适应新的教育环境与技术条件, 在维持必要权威与促进教育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以实现有效教学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教师权威, 数智时代, 逻辑转向, 价值重构, 智能教育

The Logical Shift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er Authority in the Digital Age

Yini F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8, 2026

Abstract

Teacher authority refers to the power or influence that teachers possess during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rocess, enabling them to gain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their students. In the era of rapi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his authorit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shifts. As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rough increasingly diverse channels,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he teacher—as the sole source of knowledge and the moral guide—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hereby undermining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s of teacher authority.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eacher authorit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文章引用: 范旖旎. 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逻辑转向与价值重构[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9): 339-349.

DOI: 10.12677/ve.2026.159399

external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its eros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it proposes pathway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teacher authority across four dimensions: traditional authority, statutory authority, knowledge authority, and inspirational author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authority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must adapt to the new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seek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essential authority and foster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and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

Teacher Authority, Digital Age, Logical Shift, Value Re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师权威是教育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它关系到教育活动的秩序、效率以及教育目标的实现。教师权威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维护教学秩序，更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然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师权威的传统基础正经受挑战。一方面，随着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变得多样化，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被削弱，学生不再完全依赖教师获取知识；另一方面，数字化教育环境促使传统师生“不平等”的关系被打破，教师的传统权威因此受到冲击。同时，教师的感召权威也因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增强而式微，教师个人魅力对学生的影响不再像以往那样显著。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师权威必须在多个层面进行重构。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DeepSeek 等)深度嵌入教育为标志的“数智时代”，其与以互联网普及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存在本质区别。数智时代的技术逻辑已从“信息连接”转向“智能生成”，技术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载体，而是能与教育进行深度融合[1]。在此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显得愈发重要，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同时，建立更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成为必然趋势，这有助于促进师生间的有效互动和沟通。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合理地利用教育政策和技术支持来推动教师权威的重构，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教师权威的多维度界定、演变与功能价值

马克思·韦伯将权威分为法定权威、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克利佛顿和罗伯特在此基础上将教师权威分为传统权威、法定权威、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见[2])。这一四维度框架为理解教师权威的内部结构与历史演变提供了基本坐标。

2.1. 教师权威的界定

教师权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在教育领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师权威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的教师权威来源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取向的“天地君亲师”，教师权威被上升到天道权威[3]。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通过自己的优良品质和行为举止，成为学生效仿的典范。传统教育中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教师的职位和地位，同时也依赖于法定权威，即教师按照学校的规则和制度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管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师权威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现代教师权威更强调民主性、公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再仅仅是基于教师的身份和法定地位,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个人魅力。教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教学的热情,以及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综上所述,教师权威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多维度概念,它已经从过去单纯依赖于职位和规则的权威,转变为今天更加注重平等、公正、包容和开放的新型权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素养、个人魅力以及与学生的有效沟通,成为获得学生尊重和信赖的核心要素。

2.2. 教师权威的演变过程

中国教师权威的演进与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经历了四个阶段:

权力型教师权威。在农业文明时期,教师权威主要基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这一时期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维护者。他们的权威来自于封建君权的赋予和社会礼制的约束,体现了“官师合一”和“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

专业型教师权威。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教师权威开始向专业化转变。这一时期,教师的职业权利和专业地位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教师的权威不再仅仅依赖于权力的赋予,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之上。教师被视为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其权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智慧型教师权威。在后工业文明时期,教师权威进一步发展为智慧型。这一时期,教育的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为教师提供了新的权威来源[4]。教师的角色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学习者,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与学生平等对话和互动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教育的双向互动和共同成长。

人文型教师权威。在生态文明时期,教师权威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全面发展。这一时期的教师权威强调教师在教育生态场域中的作用,旨在实现教师关于真、善、美的人文统一。教师的权威不再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引导和激励上。

2.3. 当下教师权威的特征

教师权威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他们拥有知识和智慧,能够引领学生走向知识的殿堂。这种权威不是被强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一种能力上的差异。教师因为懂得更多,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帮助和指导学生的责任;学生也会因为教师的智慧和能力而尊敬和信任他们。

教师权威的伦理意涵是其核心特征之一。它要求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在教育过程中展现对学生的关爱、责任感和道德感召力。这种权威的运用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进步,也包括情感、道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教师权威的运用需要建立在对学生的深切理解和真诚关心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并引导他们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向善性是教师权威的另一个关键特点。它体现在教师权威的每一个层面,从教育的起点到过程,再到教育内容的选择,都致力于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和社会的规范价值[5]。教师权威的运用旨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成员。这种向善的追求要求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方法,确保教育活动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道德和智力发展。

有限性也是教师权威的重要特征。教师的这种权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以帮助学生成长为目标,随着学生逐渐长大、懂得越来越多,教师的权威就会慢慢减弱。最终,教师希望学生能够独立自主,能够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因此,教师权威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它随着学生的成长而逐步让渡,直至学生能够完全自我管理。

2.4. 教师权威的功能价值

正因具备上述伦理意涵、向善性与有限性，教师权威在学校教育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这既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保障上，也体现在师生关系的构建中。

助力教学质量。教育是社会专门用来培养人才的一部分，它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不能随意进行，因此不能完全缺乏管理和指导。学校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小型社会，具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学生需要一个有序、规范和公平的生活学习环境。涂尔干曾指出：“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一种权威性活动。[6]”教师权威作为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影响力，能够为营造这样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作为知识的传递者和学习的引导者，教师的权威地位使学生更倾向于接受其指导和建议。这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关系，有效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教师能够更加顺畅地组织和实施教学内容，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的进度和效率。在教师权威的积极影响下，学生更容易集中精力于学习任务，教师通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热情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使学生更愿意接受挑战、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在学术探索中追求卓越。

有效构建师生关系。教师权威同样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了必要基础。师生关系的核心在于双向沟通和理解，而教师权威确保了这种沟通的顺畅和深入。教师权威的本质蕴含着对学生的爱，这种爱类似于父母对子女的爱，自然、温柔而有力，它是教师权威的基础。当学生感受到这种师爱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顺从并认可教师的指导，这种顺从和认可构成了教师权威的实质[7]。没有教师权威的存在，学生可能不会认真对待教师的指导，导致教育信息无法有效传达，进而阻碍师生之间的深层次交往。当教师以专业知识、公正和关怀为基础建立权威时，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参与和投入，学生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发展出必要的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说，教师权威以爱和责任为核心，为教育过程提供了结构和方向，确保了教育的有效性和师生关系的稳定性。

3. 教师权威消解的优势与弊端

教师权威在数智时代所遭遇的并非单向度的衰退，而是一体两面的结构性变动。它既释放了教育关系中长期被压抑的平等化与自主化潜能，也暴露了秩序维持与价值引领层面的现实危机。消解与固守各自蕴含着风险与可能，二者的交织构成了当前教师权威处境的复杂图景。

3.1. 教师权威消解的优势

3.1.1. 促进师生关系平等

传统语境下，教师兼具知识权威与道德楷模双重角色，其社会地位主要由知识传递与道德教育领域的垄断性优势所支撑。搜索引擎与在线公共知识数据库的出现，首先打破了教师对知识信息的垄断壁垒，使学生获得了与教师近乎同步的信息获取渠道，师生间“信息位差”的缩小，直接动摇了传统师生关系中基于“知情差异”形成的不平等结构。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即时响应学生的多样化提问，并提供多维度分析框架时，学生不再依赖教师提供“标准答案”，师生之间的知识位差被进一步压缩，师生平等对话的技术基础由此得以确立。这种平等化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学习场域，提升学生表达个人观点、参与课堂研讨的意愿，该变化不仅对学生个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也能够优化班级整体的学术氛围。

3.1.2. 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

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权威对学生行为形成约束，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个性化发展通常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搜索引擎的普及为学生提供了按需检索任意研究主题信息的渠道，使其能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调控学习节奏，摆脱了对教师按固定进度讲授的路径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则赋予学生独立完成学习产

出的能力，学生不仅可自主完成信息获取，还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初稿撰写、方案设计、思路拓展等以往需教师深度介入方可完成的学习任务。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学生独立探索学习的边界越宽泛，这为自主性学习构建了此前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支撑体系。在项目式学习场景中，学生可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完成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学习；在小组协作讨论场景中，学生可通过互动交流与协作掌握观点表达、倾听意见与共识达成的技能，而此类社交技能对学生后续的社会适应与职业发展具备重要价值。

3.1.3.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在教育领域信息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教师群体亟须对自身专业技能进行反思与重构，而教师传统权威的消解也为教师实现自我发展与教学创新提供了空间。搜索引擎打破了教师对知识的垄断地位，教师需要从原有的“知识储备存量优势”转向“知识理解、整合与评判”的能力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层级的要求。当人工智能可快速生成知识综述与方案框架时，若教师仍停留在知识搬运的传统角色层面，便极易被技术替代。唯有在教学设计创新性、育人引导针对性等人工智能难以覆盖的领域构建专业核心竞争力，方可真正实现专业素养的实质性提升。因此，教师需要持续更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强化专业能力与创新精神，以适配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3.2. 教师权威消解的弊端

3.2.1. 导致教师地位下降

传统教育活动以知识传授为核心展开，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高度依赖教科书和教师讲授。搜索引擎的出现推动知识获取呈现即时化与扁平化特征，师生间的“信息位差”不断缩小，直接削弱了教师因“先知先觉”所形成的职业威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则对教师传统权威带来更为深刻的冲击。当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完成信息检索，还能实现信息整合与内容生成时，教师作为“智力示范者”的角色形象开始发生松动。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部分教师在知识更新与信息获取层面已落后于学生。当教师无法向学生输出最前沿的知识内容时，学生对教师专业性的怀疑便随之产生，传统单一化的知识权威格局也随之逐步向现代化多元路径转型[8]。随着学生对知识自主权的掌控程度不断提升，其对教师单向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接纳度持续降低，进而对教师角色定位与既有教学方法产生质疑，这一变化最终导致教师在学生认知中的地位出现下降。

3.2.2. 造成教育秩序混乱

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普及的背景下，教师权威消解已对既有教育秩序形成直接冲击。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为学生拓展了异于教师讲授的信息获取渠道，教师不再是课堂场域中唯一的知识权威，这也为学生质疑教师讲授内容提供了现实基础。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针对各类问题输出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应答内容时，学生更倾向于认可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客观性”，并对教师讲授内容的“主观性”产生质疑，导致教师维持课堂话语主导权的难度显著上升。技术智能化水平越高，建立在教师“知识占有量”基础上的课堂秩序控制力就越薄弱。这一变化不仅会动摇教师在学生认知体系中的既有地位，还可能引发学生对教师引导的抵触心理，最终对课堂纪律与整体教学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在部分场景中，课堂秩序的混乱还会向学校其他管理领域扩散，进而对学校整体教育运行秩序产生冲击。进一步而言，若教师权威消解未得到合理的边界约束与有效的替代机制承接，原本由教师权威维系的教学秩序易出现管控真空，最终引发教学管理层面的失序问题。

3.2.3. 弱化道德教育渗透

教师历来被视作道德与价值观的传递主体，其角色不仅限于知识传授，更通过自身行为示范对学生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学生塑造道德人格的榜样。传统教育语境下,教师的言行对学生道德养成具有直接示范作用,然而在技术介入后,这一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搜索引擎可将多元且彼此冲突的道德观念同步推送给学生群体,教师不再是学生接触道德规范的核心入口,传统单一化的价值参考体系由此被打破。当人工智能能够针对各类伦理困境提供多立场分析框架后,学生逐渐适应“各说各有理”的多元价值表达模式,对教师传递的确定性价值引导更容易产生心理疏离。技术提供差异化视角的能力越强,教师道德教育的渗透力就越被稀释。“知识既有能力性和思维逻辑,也有伦理性和伦理逻辑。知识的伦理性是知识价值观的灵魂,是文以载道和教学具有教育性的基本途径和方式”[9]。当教师的道德权威被弱化、道德教育渗透力下降后,学生难以从教师处获得稳定清晰的价值指引,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环境中,更容易被错误价值观误导,进而形成扭曲的道德认知。

4. 教师权威困境的内在矛盾与外部挑战

祛除权威会丧失秩序,固守权威会抑制创新,但这种内在矛盾并非权威困境的全部。在“消解”与“固守”的拉锯之外,更深层的外部力量正在悄然重塑权威的生成基础。算法与平台以“客观”“中立”的姿态深度介入教育过程,构建起一种超越师生传统互动框架的新的权力结构。教师权威的弱化,表面上受益者是学生,实质上教师和学生同时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技术权力网络之中。

4.1. 消解与固守的内在矛盾

前述消解的优势与弊端表明,教师权威面临的是消解与固守之间的结构性两难。权威在保障教学质量、构建师生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权威本身若不加反思地固化,同样会构成阻力。当教师因循既有方法而对新的教学模式持保守态度时,教学创新便难以发生;当学生过于依赖权威的指导而不敢质疑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便受到限制;当权威过度强势而压缩学生参与教育决策的空间时,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便会受阻。换言之,权威的消解过度会丧失秩序与引领,权威的固守不变则会抑制创新与民主,两个方向的风险同时存在。权威与民主自治是相对的,学生民主与自治不能脱离教师权威而存在,否则自治将成为一盘散沙[10]。

这意味着,教师权威面临的真实困境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的问题。既不能因权威过度消解而丧失教育秩序与道德引领,也不能因权威固守不变而抑制教育创新与民主发展。“在维持必要权威与促进教育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由此成为数智时代教师权威建构的核心命题。

4.2. 算法权威与平台权力的外部挑战

在教师权威与所谓“学生赋权”的表面对立之外,一个更深层、更隐蔽的权力转移正在发生。算法与平台正在以“客观”“中立”的姿态,悄悄填补教师权威弱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表面上看,教师的权威是被学生“夺走”了,实质上,教师和学生同时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技术权力结构之中。

所谓“算法权威”,是指基于大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所形成的对教学过程的隐性支配力。在线教育平台能够记录学生的每一次答题与回看,自动生成学情分析报告、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教师的教学判断在无形中被平台的算法输出所规训,学生的学习画像被平台的数据分析所定义,教师的教学决策权在不知不觉中让渡给了算法的分析框架。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的推荐逻辑倾向于依据点击率、正确率等可量化指标优化路径,往往迎合学生的即时偏好而非促进其深层认知发展。当学生习惯了算法的“合口味”推送后,教师要求学生挑战困难、深入思考的引导便显得“不合时宜”,教师的专业判断与算法的优化逻辑之间由此产生结构性冲突。所谓“平台权力”,则指教育技术平台作为商业实体,通过掌握教育资源分配权、学习过程监控权与评价标准制定权所形成的系统性支配[11]。当平台深度嵌入教学,什么

知识值得推送、什么能力值得测评，这些原本应由教育者自主判断的问题，正在被平台的算法设计与商业逻辑所预设。

从师生两个主体的维度来看，这种外部权力介入带来的挑战是双向的。对教师而言，算法与平台的介入不断压缩教师的专业自主空间，但教学进度、内容选择、学情判断都需要参照平台给出的标准化结论，教师基于教学经验与对学生个体了解形成的专业判断便容易被边缘化，长期下去会逐步消解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与职业自信。对学生而言，算法定义下的“个性化学习”本质上是被算法标签化、标准化的定制，看似满足了个体需求，实则将学生的认知视野禁锢在算法之中，学生接触多元知识、拓展认知边界的可能性被不断压缩，反而阻碍了其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这种由算法权威与平台权力带来的外部挑战，本质上是技术资本向教育领域渗透所引发的权力再分配，其不仅冲击着传统教师权威的存在基础，更重构了教育领域的权力结构，若不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与引导，最终会偏离教育育人的核心目标，这也为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重构提出了更复杂的现实命题。

5. 数智时代的教师权威建构

对权威困境的剖析最终需落脚于建构性回应层面。在数智时代，教育在技术形态、学习模式与知识边界三个维度均呈现出与工业时代教育存在显著差异的特征，上述特征共同构成了数智时代教师权威重构的客观基础与现实约束。基于上述数智时代的教育特征，教师权威的四个维度均需开展针对性调适。

5.1. 数智时代教育的特点

5.1.1. 技术深度融合：从辅助工具到教育基础设施

在数智时代，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技术理性逐渐统治了社会，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成为学习者的主要学习内容[12]。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互动的学习体验。

技术已不再是教学的辅助工具，而是深度嵌入教与学的全过程。从课堂互动的智能答疑系统，到基于学习数据的学情分析，再到个性化学习资源的精准推送，技术已经成为覆盖教育全场景、串联教学各环节的基础支撑性设施。这种基础性的技术嵌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权威的生成基础。传统教师权威建立在对知识的垄断之上，而在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今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其权威也不再来源于信息存储量的优势，而是转而建立在对信息的筛选、整合与解读能力以及依托技术实现个性化引导的专业能力之上。

与此同时，这种深度融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技术工具本身具有中立性，其设计逻辑隐含着算法偏向与价值预设，如何引导学生理性看待技术提供的信息、规避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成为数智时代教师必须承担的新职责。这意味着，教师的权威不再依托对知识的占有，而是依托对技术工具的合理运用与价值把控，通过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挖掘，实现对学生更精准、更全面的育人引导。

5.1.2. 学习路径定制化：从标准化生产到因材施教

在数智时代，教育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和个性化。智慧教育的各种教学场景，如虚拟现实教育、远程互动教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评测、校园智能管理等，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进行个性化、定制化学习和沉浸式课堂教学体验[13]。

传统教育长期沿用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统一的课程进度推进教学。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个体在不同方面的差异，难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而在数智时代，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准赋能，教育终于具备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条件。通过对学生日常学习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技术可以快速定位学生的知识薄弱点，识别其兴趣特长，进而为每一位学生匹配适应其发展

需求的学习内容，真正打破了标准化培养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束缚。

这种学习路径的定制化转向，同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权威的生成逻辑。传统模式下，教师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统一进度、统一要求”的教学安排之上，教师按照预设方案推进教学即可维持课堂秩序与自身权威。而在定制化学习的场景中，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与需求差异显著，教师不再是统一教学进度的把控者，转而需要成为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设计者与引导者。这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通用的教学方法，更要具备对学生个体特征的精准研判能力，能够结合每一位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策略，在尊重学生差异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指导，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5.1.3. 知识边界消融：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整合与全球视野

在数智时代，跨学科整合与全球视野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学科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交叉融合成为常态，不仅打破了学科壁垒，还催生了大量创新成果。在教育领域，跨学科教育模式正日益受到重视，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引导学生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问题，培养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许多现实问题本身并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知识框架，而是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知识协同分析。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等全球性议题，还是解决产业转型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都要求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视角，才能获得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这种知识边界的消融，彻底打破了传统教育中教师依托单一学科建立知识权威的基础。过去，教师只需深耕自身所属学科领域，凭借扎实的专业积累便能赢得学生的认可。而在数智时代的跨学科教育要求下，教师不仅要对本学科知识有深入理解，还需掌握相关学科的核心内容与研究方法，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帮助学生搭建起系统化、整体性的知识框架。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也推动着知识视野从区域转向全球。数字技术使全球各地的知识成果与文化观念得以即时共享，教育不再局限于本土知识的传授，而是要求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视野，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学会在全球语境下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一变化对教师的知识储备与认知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推动了教师权威的转型。

5.2. 教师权威的转型与重塑

5.2.1. 师道重塑：传统权威在现代教育中的新定位

传统权威，源于师道尊严，强调的是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和道德引导者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者对教师大力推崇，促成了一种大众“尊师”的传统民间文化建构，为教师的传统权威确立奠定了文化根基^[14]。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对教师个人的敬仰，还体现在对教师所传授知识和道德价值的尊重上。然而，在数智时代，知识的获取途径日益多样化，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设备等渠道轻松获取海量信息，教师的知识垄断地位被打破。同时，随着社会对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需求增加，传统权威中的灌输式教学和权威式管理也显得格格不入。

将传统师道的创造性转化落地为具体教学实践，可从以下路径推进。在课堂教学维度，教师可构建“AI 预学 + 课堂深研”的环节架构。课前组织学生借助人工智能完成基础知识的自主习得，课堂环节则聚焦于教师主导的深度探究。以历史课程教学为例，教师可先布置学生依托人工智能检索该事件的基本史实与多元评价，课堂教学环节围绕“同一历史事件为何存在不同评价”展开议题讨论，教师通过追问引导学生辨析不同史观的差异，此时教师权威的内涵也从“掌握既定事实”转向“主导认知辨析”。在思政课程“公平正义”议题教学中，同样可遵循该模式，先由学生依托人工智能检索不同社会制度语境下的代表性论述，课堂环节组织学生对各类论述背后的价值预设进行辨析。

在日常师生互动维度,教师可通过制度化的“价值议题对话”落实“同行者”的角色定位,打破传统单向度的价值传递模式,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价值引领。例如在面对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伦理议题时,教师不再以绝对权威的身份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以共同讨论者的身份参与对话,引导学生自主梳理不同立场的逻辑脉络,反思不同选择背后的价值取向,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与主流价值要求的道德观念。这种对话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师道中教师的道德引导职能,又适配了数智时代学生主体意识觉醒的特点,让教师的道德权威从外在的身份赋予转向内在的认同生成。

5.2.2. 法定与自由:平衡教育规则与创新的新策略

法定权威是教师权威的制度基础,它赋予教师开展教学、维持秩序、进行评价的法定权力,是教育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的前提。但法定权威并不等同于强制约束,若教师将法定身份异化为压制学生自由探索的工具,便会回到权威固化的老路,挤压教育创新的空间。反之,若完全放弃法定权威的边界约束,任由教学活动陷入无秩序的自由发散,也会落入权威消解过度的困境,最终损害学生的学习权益与成长质量。

由此可见,在法定权威框架内把握自由探索的边界,在开放创新的同时坚守法定规则的底线,是数智时代平衡秩序与活力的核心方向。从实践层面看,平衡法定权威与创新自由首先需要明确规则的核心边界,核心边界应当聚焦于保障教育活动的公益性、育人目标的正向性与教学过程的安全性,在此边界内为学生预留足够的自主探索空间。例如在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创新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依托法定权威明确项目的育人目标、伦理要求与安全规范,为学生的探索活动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同时不对具体的探究路径、解决方案进行强制统一,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兴趣与认知尝试不同方案,在开放探索中激发创新思维。

在课堂管理实践层面,可通过分级授权模式构建法定权威与创新自由的动态平衡机制。针对基础知识学习、常规课堂秩序等基础性教学环节,教师应严格落实法定权威要求,维持稳定的教学秩序,保障核心教学任务的有序推进;针对开放性议题讨论、跨学科实践创新等拓展性教学环节,则可适度下放自主权限,鼓励学生自主组织活动、主导讨论进程,教师仅在探索过程偏离育人方向、出现伦理风险或秩序失控时,依托法定权威介入调整,从而既为创新探索预留开放空间,又避免过度自由引发的秩序失范问题。该动态平衡模式既保留了法定权威对教育秩序的保障作用,又为教育创新留出充足空间,可有效适配数智时代教育改革对灵活教学组织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法定权威还需承担规制平台权力、守护教育公益性的制度屏障功能。当平台依托商业逻辑,试图以“效率优化”“数据驱动”为名预设教学内容与评价标准时,教师应依托法定赋予的专业自主权,对平台嵌入教学过程的深度与路径保持审慎判断,坚守育人目标对技术应用的方向性引领作用,防范教育活动的公益属性被技术资本的商业逻辑侵蚀。

5.2.3. 知识转向:从存量权威到流动权威的新形态

在数智时代,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正在经历深刻的重塑。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教育的形态,也使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根本变革,进而重塑了教师知识权威的生成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需要采取新的策略来保持其在知识更新和传播中的领航地位。

将“流动型权威”理念落实为具体教学实践时,其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存在显著差异化特征。以“人工智能伦理”跨学科课程为例,教师首先布置任务,要求学生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检索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文本,后续课堂环节围绕“AI生成内容是否应强制标注”这一真实议题组织辩论。辩论过程中,教师不强行统一认知结论,而是聚焦于梳理辩论逻辑、点出论证逻辑漏洞、澄清多元立场的价值内涵,引导学生自主形成兼具逻辑合理性与契合自身价值观的判断。在该实践模式下,教师

权威不再依托预先储备的固定知识存量，而是依托动态生成的专业能力，在开放化探究过程中实现对学生认知发展与思维能力的引导。

从整体逻辑层面分析，从存量权威转向流动型权威，本质上是数智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变革在教育领域的必然投射。传统教师权威建立在“知识是固定、可垄断的存量”这一认知基础之上，而数智时代知识生产速率加快、传播边界逐步开放，知识始终处于动态更新与流动建构的过程中，这要求教师的权威基础必须从“占有知识”转向“生成知识的方法能力”。这一转向同时是教师回应算法权威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平台算法依托正确率、点击率等可量化指标推送学习路径、预设“什么知识值得学习”时，教师应以专业判断对算法结论进行批判性审视，将算法生成的学情分析结果作为参考而非决策依据，结合育人目标与学生长远发展需求对算法推送内容进行再筛选与价值校准，进而夺回学情研判与知识选择的专业主导权，在技术主导的教育环境中守住教育育人的价值底线。

5.2.4. 感召回归：师生情感联系与内在潜能激发的新路径

在数智时代，教育的边界被无限拓宽，师生关系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感召权威，这一融合了情感智慧与引导力量的教育理念，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当个性化学习路径和自主学习成为常态，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直接接触反而可能因技术中介而减少，感召权威的情感基础面临被稀释的风险。因此，感召权威急需在数智时代回归到师生情感联系这一教育本质。

从实践路径而言，感召权威的构建首先要求教师重新定位自身与学生的互动模式，完成从“统一教学的实施者”向“学生成长陪伴者”的角色转型。当数智技术承接了标准化知识讲授、作业批改等大量事务性工作后，教师得以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与学生的深度情感互动中。例如，当学生主动告知教师其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课后作文时，教师无需急于开展批评处罚，可将该事件作为契机，与学生展开关于学术诚信与 AI 工具合理使用边界的深度对话。既坚守禁止代写的原则底线，又传递“教师信任学生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正向期待，该处理方式相较于简单禁止更易获得学生的尊重与信赖。教师还可通过日常谈心、小组分享、成长记录等方式，精准把握每位学生的心理状态、兴趣志向与成长困惑，在学生遭遇学习瓶颈、产生情绪困扰时提供及时的支持与引导。

在个性化育人实践场景下，感召权威的构建可结合智能技术实现情感适配的精准化。依托人工智能对学生学习行为与社交互动数据的分析，教师能够更为敏锐地捕捉学生的情感波动与潜在发展需求，规避因信息偏差错失学生成长信号的风险。以性格内向、课堂参与度较低的学生群体为例，教师可基于数据分析识别其兴趣方向，设计契合个体特质的展示与参与任务，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建立学习自信，在个性化支持体系中深化师生情感联结。构建以深度情感联结为基础的感召权威，能够推动教师真正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角色转型。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与能力的同时，可充分激发学生的内在成长动力，助力其成长为兼具独立人格与社会责任的完整个体，这正是数智时代教师权威重构的核心价值指向。

教师权威在数智时代的命运，并非简单的消亡或存续，而是一场深刻的合法性重构。技术冲击打破了教师赖以垄断知识的旧有根基，却也为权威的转型打开了新的空间。真正的问题始终不在于“要不要权威”，而在于“以什么为权威”。当知识不再稀缺，教师的价值便不再取决于“知道多少”，而取决于能否在信息洪流中为学生锚定方向、在技术主导的环境中守住育人的温度。这一重构的完成，意味着教师从知识的占有者转变为价值的守护者，也意味着教师权威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继续为有效教学与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胡钦太, 张彦, 伍文燕.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逻辑、困境与路径[J]. 中国电化教育, 2026(6): 1-6+23.

-
- [2]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209.
- [3] 黄庆丽. 教师权威的丧失与重建[J]. 教师教育研究, 2016, 28(3): 18-23+93.
- [4] 戴妍, 陈佳薇. 我国教师权威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审视[J]. 教师教育研究, 2021, 33(3): 24-30.
- [5] 裘指挥, 付欣悦. 论教师权威的正当性[J]. 教育研究, 2024, 45(3): 138-146.
- [6] 涂尔干. 教育与社会学[M]. 马和民,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
- [7] 宋晔, 牛宇帆. 教师权威: 爱与惩罚的道德张力[J]. 教育科学研究, 2016(7): 19-25.
- [8] 田友谊, 张悦. 后现代视域下教师知识权威的消解与重构[J]. 江汉学术, 2020, 39(6): 95-103.
- [9] 郝文武. 西方哲学知识伦理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5(2): 26-38.
- [10] 潘小芳. “祛魅”与“返魅”: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权威的危机与重塑[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1): 116-124+128.
- [11] 胡德庆, 蒋娟. 基础教育数智平台的异化根源及其风险消解[J]. 教学与管理, 2025(31): 1-7.
- [12] 李森, 刘欢. 数智时代教学关系变革的再认识[J]. 教育研究, 2025, 46(4): 99-111.
- [13] 吴昊桢, 袁艺标. 从异化到回归: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重构[J]. 中国电化教育, 2025(6): 80-86.
- [14] 邹小婷. 教师权威: 对正被放逐的一种教育理性慎思[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1): 149-154.